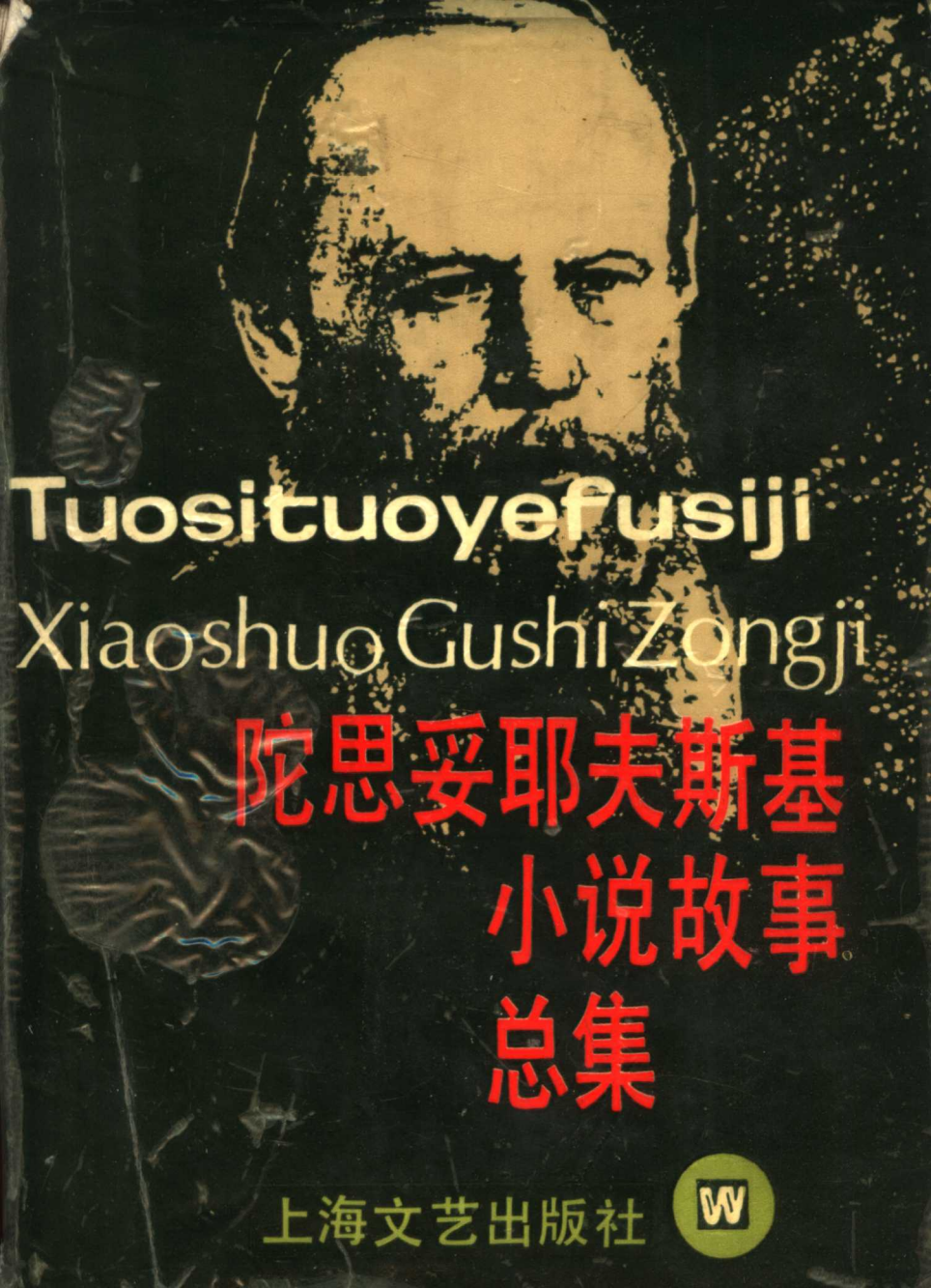




Tuosituoyefusiji
Xiaoshuo Gushi Zongji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故事
总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故事总集

本社编 顾问 陈 燊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何礼蔚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故事总集

本社编 顾问 陈 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625 插页 6 字数 585,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321-1300-0/I·1012 定价:27.00元

序

陈 桑

在俄国的文学庙堂上，居于前列的诗人或作家几乎都是殉道者。拉季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屠格涅夫、谢德林、柯罗连科：他们的命运是自杀、被杀害、囚禁、贬谪、流放、流亡，最幸运的也是以早死而免陷囹圄。列夫·托尔斯泰虽因其声望而幸免，但也受秘密监视，以至被革除教籍，列为教会定期诅咒的对象。在这部文祸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显得十分突出。他和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才听到沙皇的赦免令，继之是服苦役和充当列兵。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忠贞不屈，成为“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则不惜妥协，仍被秘密监视终身。政治上的这些迫害，给他的世界观以巨大的震荡。人们称他为“残酷的天才”或“病态的天才”，我认为，他乃是被扭曲了的天才。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父亲因晋升八级文官，获得贵族身份，并购置了两个小田庄。这是一个暴躁任性、专横冷酷的人。他的妻子(作家的母亲)善良贤慧，因不堪他的妒忌和折磨，很早去世。他自己则因虐待田庄上的农民，为他们聚殴致死。母亲的遭遇，父亲的为人和结局，都在未来作家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

费奥多尔因父命难违，进入军事工程学校念书，但他自己的爱好始终是文学。在学校里，于夜阑人静之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欧文学，同时开始写作，写过两个模仿性的浪漫主义悲剧。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对此他索然无味。他坚信自己“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翌年便呈准退役，专心致志于文学工作。他最早发表的是译作——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坎坷，却颇多传奇因素。如初登文坛，一鸣惊人；被处死刑，绝处逢生；以及中年的带点浪漫色彩的爱情和晚年的夹杂着悲喜剧味道的生荣死哀等。

处女作《穷人》写成后，由他的同学、刚出场的作家德·格利戈罗维奇送给出版家、诗人涅克拉索夫看。他们两人于当天晚上津津有味地轮流把这部长达七印张的小说一个劲儿读完，拂晓时便一起去看望作者。随后涅克拉索夫又带稿子去见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是“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是一口气读完，赞许这位年方二十五岁的作家为“天才”，当这位作家翌日去拜访他时，他又预言作者会成为“伟大作家”。受到当时俄国批评界这位权威的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受宠若惊。他晚年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颗新星就这样迅速而璀璨夺目地出现了。

当时俄国文坛，包括像屠格涅夫那样未来的名作家，都才闪现微弱的光芒。果戈理是文苑中的宿将和盟主，成为“另一个果戈理”，真是超轶群伦，大大出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意料之外：“难道我真的如此伟大？”可是，面对一片赞扬声，他未免有点陶醉，未免自视过高，甚至说，别林斯基等人发现，“我远远超过果戈理”。据女作家巴纳耶娃说，他过分自负，以致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在闲谈中用带刺的话”来刺激他。其中屠格涅夫还写了冷嘲热讽的打油诗《赠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忍受他们前恭后倨的态度，时常与

他们争论。加深这种裂痕的是他以创新自赏的小说《双重人格》，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应有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和别林斯基在思想上的重大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另一个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因此，不久，他就和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以至批评家本人绝交了。

此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突转”——由顺境转入逆境。

早在一八四六年春，他邂逅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从一八四七年春起，便开始参加后者组织的小组的“星期五”聚会。小组中各个成员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信仰傅立叶学说，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的体系”，以“博爱”鼓舞人，限于“经济改革”，“不诉诸政治改革”。但他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左翼、激进派斯佩什涅夫的小组，参与建立宣传解放斗争的秘密印刷所及其发动政变的计划。

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晨他为沙皇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三十四人），主要罪名是在小组会上宣读过地下传抄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信中提出“废除农奴制、废除体刑”等主张。在审讯过程中，他光明磊落，主动承担责任，竭力为同志们辩解。最后被判处死刑。但这是假死刑。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他和同案犯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刹那才宣读沙皇谕旨，免去死刑，改处服苦役四年，之后再充当列兵五年。这次假死刑被彼得拉舍夫斯基搞成一场闹剧：他在穿上白布殓衣时纵声大笑说：“先生们……我们穿上这件又大又肥的长袍……一定会显得滑稽吧！”但这假死刑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了沙皇所预期的效果。自刑场归来的当天他写信给长兄，说自己“决不灰心”（主要是说决心要继续从事创作：“假如不能写作，我将会死去”；“宁愿监禁十五年，只要手能握管”），却又沉痛地声称：我们以前的“各种希望在这一瞬间已被从我内心挖出来埋掉”！他的信念和

理想动摇了。此后四年苦役的“炼狱中的生活”，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又使他“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并暗自发誓，“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和过失”，也就是说决计改“过”自新了。当然，这种转变极其痛苦，十分曲折而又充满矛盾；他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有如巨石底下的小草总是扭扭曲曲地冒出来。

苦役期满后开始当兵，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文学事业现在成了他的生命。他不惜一切，谋求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他向生活伸出了橄榄枝。考虑到当时不便写小说，便先写诗。先是按官方的调子写了一首《有感于一八五四年欧洲事件》，它博得他的上司步兵营长的青睐。命运之神也在此时开始向他微笑。当地一位新上任的省检察官亚·弗兰格尔过去曾满怀同情目击在刑场上的他，现在便屈尊与他这个列兵结识，于是此后他得以出入上流社会，成为营长、法官以至总督家中的座上客。随之是沙皇尼古拉暴卒，较为开明的新沙皇亚历山大即位，政治气氛稍有缓和。一八五五年夏他写了第二首诗《一八五五年七月一日》（皇后生日），请求转呈给皇后；一八五六年春又为新皇行加冕礼与缔结和约写了颂诗。他还不顾军纪规定，致函现任皇帝侍卫长艾·托特列卞（过去同他认识），表示悔过，说自己的思想、信仰以至整个人都在变化。所有上述一切努力都为求沙皇允许他发表作品。但对此沙皇并没有马上同意，除批准他晋升准尉外，命令予以秘密监视，待查明他政治上可靠后再行定夺。不过，实际上，他在次年四月就恢复贵族身份，八月，他被捕时写于狱中的《小英雄》就以笔名在《祖国纪事》上刊出。

他的宿愿终于在一八五九年实现：先是获准以陆军少尉退役，恢复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年底又被批准可以移居彼得堡。重返文坛对他来说意味着生命的复苏，虽则仍受监视。

阔别十年，俄国文学界已面目一新：除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赫尔岑、皮谢姆斯基等名作家外，列夫·托尔斯泰作为

新秀也已崭露头角。陀思妥耶夫斯基饶有兴趣地阅读屠格涅夫等人的新作,并满怀信心和豪情“要同所有人决斗”。他还看到文学气氛随同政治气氛的变化而变化:围绕着迫在眉睫的农奴制改革问题的论争,过去别林斯基的《现代人》杂志同人分裂为自由主义者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两个阵营,与斯拉夫派鼎足而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现代人》早就断绝关系。现在他要走中间道路,并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根基论”,其主要思想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知识界)应当在宗教、伦理的基础上与人民结合,而人民就是历史的“根基”。不过,他所谓的“人民”只是那些忠于沙皇、笃信东正教的“老百姓”,其主体不是农民,主要是贵族的家奴(如《少年》中的马卡尔)、小市民以及部分贵族,是那些谦恭温顺、逆来顺受的人。促使他形成这种观点的固然部分地是因为在流放地看到贵族与人民的对立(其实他在那里也看到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人们),部分地是因法国二月革命失败而对政治革命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有余悸,慑于沙皇淫威,为了自我保全而作出一些妥协。“根基论”不仅基于错误认识,主要是以理论形式为自己这种妥协立场所作的辩护,也是这种立场的理论外衣。

回到首都后,他先后主编以他的长兄米哈伊尔名义创办的《时代》(《Время》,1861—1863)和《时世》(《Эпоха》,1864—1865)两个杂志。这是他宣扬“根基论”的阵地。刊物的主要合作者,如尼·斯特拉霍夫和阿波隆·格利戈里耶夫都是他的志同道合的批评家,是他的左右手,前者还直接是斯拉夫派。《时代》一般说还能持中间立场,但仍不能为沙皇政府所容忍,终于因斯特拉霍夫的一篇论波兰起义的文章而被迫停刊。继它创办的《时世》殷鉴前车,并迫于当时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严格按照当局的要求——“保持无可指摘的倾向”,整个地向右转,其方针就是同“虚无主义者”决裂,同《现代人》作战,也就是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他们所宣传的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作战。在这场论争中,他有时直接通过文章、有时

则以艺术作品作为论战的手段。如《地下室手记》(其第一部发表于《时世》创刊号)、《鱈鱼》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位批评家当时已被捕,这不啻落井下石。而从《罪与罚》起,反“虚无主义”的主题贯穿于他后期的全部长篇中。顺便说说,《罪与罚》反“虚无主义”的倾向,时下评论者较少注意,而在当时则曾受到许多人谴责。有人说是“附和”“反动派”和政府“迫害革命青年”;有人虽远离革命阵营,可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满意年轻人倒无所谓,但应该“光明正大”,而不应“在暗地里扔石头”。

他反对“虚无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根基论”。在他看来,革命民主主义者似乎脱离了“根基”,不信奉“人民”所信奉的东正教而宣扬无神论,不学习“人民”效忠于沙皇而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有趣的是,过去苏联有的评论者却因此肯定他似乎是早在百年前向人类预先警告了轻视人民的“谬见”!殊不知他反对的不是尼采之流的“超人”思想,而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固然他给添上许多油彩。按照他的逻辑,实际上是,不学习“人民”的逆来顺受而敢于反抗,就是“超人”!

当然,与他的政论不同,他的艺术作品要复杂得多。尽管自《死屋手记》起的全部后期作品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含有“根基论”观点,但作品中还发出强烈的不和谐音,出现“赞成”和“反对”的对话。这对话的思想基础是:一方面是迫于外在压力对现存制度作出妥协,另一方面则是(虽然有时通过“虚无主义者”之口)没有被扼杀的人类理智和痛苦良心的呼声,也是当时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灾难、愤怒、抗议在他心灵中的回响。这种对话乃是他内心矛盾的外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大作家,像他那样存在着“双重性”,矛盾激化到几乎精神分裂的地步,真是得未曾有。

《时世》停刊后不久,《罪与罚》的问世提高了他“作为作家的声誉”;同时,他的迟到的爱情又彻底改善了他的私人生活。

说“迟到”，是因为前此有过爱情，而且不止一次，但都成了镜花水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恋爱，颇能显示他的性格的一个侧面，也给他的创作提供几个女主人公的原型。

他是一个秉性孤僻、落落寡合的人，有点像《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而其内心却燃烧着炽烈的爱情。可他“不习惯于和女人来往”，“甚至不知道怎样同她们交谈”。有人指出，他在主要作品中写的都是充满牺牲和痛苦的爱情。这也许是他的自我经验的写照。他的“初恋”对象是秀外慧中的女作家巴纳耶娃，面对这位活跃开朗而又雍容华贵的上流社会贵夫人，初登文坛的他不敢有所表示，却曾为之神魂颠倒。她的妩媚外貌和复杂性格后来被赋予《白痴》的女主人公。此后，经历了四年苦役的肉体上折磨和精神上孤独，他憧憬家庭生活，渴望一个温暖的安乐窝。在当兵的时候，爱上了小职员伊萨耶夫的妻子。伊萨耶夫因嗜酒而堕落，其妻子却是“相当漂亮”、“活泼敏感”、出身贵族、颇有教养的妇女。可是，她人虽善良，却很神经质，喜怒无常，而又身体瘦弱，不久患了肺结核。她和丈夫很像《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夫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开始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爱得发疯，她并不动心。不久伊萨耶夫去世，她又另有所爱。几经周折，他还因狂热的爱发过一次癫痫病，最后好梦终于实现。但这次婚姻，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痛苦。她动辄发怒，争风吃醋，夫妻间经常反目。这场并无爱情的爱情，以她病逝而结束。

她逝世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有过两次短暂的恋爱史，其对象一个是放荡不羁、个性强烈、颇有文化教养、在国外飘泊过数年的玛尔法·布劳恩；另一个是炮兵中将兼大地主的女儿、美艳而高傲的新作家安娜·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前者在他许多作品中留下身影；后者是虚无主义者，因思想分歧，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嫁给一位法国革命家。

一个较长期追求的对象是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她

出身农奴家庭，却受过高等教育，天真烂漫，富于幻想。她十分崇拜这位因革命思想而受苦受难的有才华的作家，想给从“死屋”中逃生的他以温暖。但热恋不久就退潮了。她认为，任何才华也不能弥补“性格的卑劣”，说自己蒙受了“屈辱和痛苦”。于是爱变成了恨。加之她从十六岁起就激烈否定“旧世界”及其艺术、宗教、民族文化等等。这位女虚无主义者甚至准备参加反政府的恐怖活动。两个思想敌对的情侣曾对许多问题激烈争论，他们的紧张关系时断时续。一八六四年她在巴黎“把爱情献给了别人”。此后他们的关系似乎又延续了一段时期，最终还是分了手。她成为《赌徒》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举止笨拙（有点像《白痴》中的梅什金）的人，却一再追求热情奔放、美艳迷人的女性，作为虚无主义的敌人而一再与女虚无主义者谈爱，其间不乏浪漫情调，不断失败自在意中。接受事实的教训，他最后采取务实态度，并终于获得真正的爱情。这次爱情来得平静，却异常迅速。牵线的是他的《赌徒》。一八六六年九月底他因前此同一个出版商订过苛刻的合同，必须在十二月一日前交出一部篇幅在十印张以上的小说稿，否则就要承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但他当时正在写《罪与罚》，难以分身。听从友人建议，他聘请了一位女速记员，记录他口授的作品。她就是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她自许为六十年代进步青年，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并不喜欢“虚无主义”。她热情而又善于自持，看来是讲求实际的人。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印象不佳，不久她就以敏捷、准确的记录博得他的好感。他也渐渐注意到她“可爱的容貌、青春的魅力和独特的风韵”。在二十六天内他口授完了《赌徒》。二十多天的写作过程也酝酿了他俩间的爱情。不久，他向她暗示了求婚的意愿。她当时二十三岁，与他相差二十四岁，但她早就崇拜这位大作家，因此欣然应允，并很快地结了婚。她真正给他带来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她不仅干练地安排好他的人口众多而

又有点“偶合”色彩(他的寡嫂一家极难相处,他前妻带来的儿子又桀骜不驯)的家庭的生活,多方设法偿还了他历年负下的巨额债欠,而且促使他幡然悔悟,抛弃了赌博狂热。从此他无后顾之忧,过着衣食无虞的写作生活,他的创作进入空前高产的时期。她还为他经营出版事务,使他摆脱出版商的操纵。她和列夫·托尔斯泰夫人,都是她们的丈夫、大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上的贤内助,都为丈夫写下回忆录,而安娜还苦心孤诣地为其丈夫身后蒙受的一些不洁名声作了洗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生活颇具异彩。

从《死屋手记》、《罪与罚》起,他的声誉日显,至七十年代中期,批评界开始把他的姓氏与莎士比亚并列。一八八七年底他当选为科学院俄罗斯语文学部通讯院士。现在,他成了贵族沙龙倒屣相迎的贵宾,还成为当时权贵波别多诺采夫的座上客。正是由于后者的推毂,他受到皇室青睐,沙皇还要他充任诸位皇子(大公)的精神导师,希望他通过交谈使他们获得教益;也正是在后者的授意下,他先后把《作家日记》、《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献皇储(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批评家格罗斯曼在涉及这些情况时写道:

他年轻时曾置身其中的首都贫民区的寒伧环境,如今被皇家宫邸富丽堂皇的背景所代替。旧科洛姆纳区那座歪歪倒倒的小木房以及木房内烟气腾腾的油灯和绽开的沙发(青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那里研究和宣传过社会主义),如今让位于大理石宫内的大厅以及阿尼奇科夫宫和冬宫的接见大厅……如今虔诚地聆听这位被欺凌和被侮辱者的歌手的是帝国皇室的高级代表人物和权贵。

这段话抚今追昔,不无讽刺味道。诚然,这些荣誉应归功于他的创作才华和成就。但也应想到,他的同时代大作家

列·托尔斯泰并未博得皇室赐予的殊荣，反而被革出教门，列为教会定期诅咒的对象。原因只在于：一个对当时专制农奴制、私有制和教会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个虽然在其优秀作品里暴露了社会生活的某些阴暗面，但却是既“反对”又“赞成”。他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我们难以想象得到的。格罗斯曼说：在当时革命风暴面前感到恐怖的上流社会为他的“布道词”“迷住了”。有的贵夫人称他为“导师”，有的贵夫人则明确地说：俄国社会在二十年迷误之后，“落到没有粮食的荒漠之中而如饥如渴”，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给人们以精神食粮。这大约指的是他反对无神论、社会主义革命——反虚无主义的说教的意义。

不过，在这么辉煌灯火的阑珊处，还可看到阴郁凄凉的背面。一方面，沙皇政府从未放松对他的秘密监视，因此他终生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委曲求全。无怪乎在一八六二年他于门口发现革命传单时，一八六六年得知卡拉科佐夫谋刺沙皇案和一八八〇年与苏沃林谈到民粹派的冬宫爆炸案时他都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实为表明心迹，以免牵连。另一方面，背弃信念，宣扬违心的迎合贵族和教会的思想，接近声名狼藉的卡特科夫、特别是波别多诺采夫等人以保全自己，并由此博得上流社会的欢迎，其清醒的良知不能不感到内疚和痛苦。他在遗嘱中要求不把遗体埋葬在别林斯基墓边，恐怕也不无“九泉相见尚低头”的难言之隐！

他的晚年还有两件大事。

一是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他以朗诵的才能和演说的艺术、特别是追求“全人类性、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等口号深深吸引和打动听众的心灵。据说，被感动的听众“发出那么巨大的哭声”，以至整个贵族俱乐部大厅四壁“被震撼得摇摇欲坠”。他“赢得的不仅是欢呼，简直是偶像崇拜”。兴高采烈的大众把桂冠奉献给他。不过，这一光彩熠熠的场面也未免有些阴影。据有的目击者说，听众中的“左翼青

年”“几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一开口时就立刻起而反对”，他们不喜欢他平时宣扬的斯拉夫主义和近似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以及“沙皇与自己人民联合”等说教，“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全部同情心转到了屠格涅夫身上”。当时在场的著名民主主义作家格·乌斯宾斯基在当天曾为其讲话深深感动，第二天就醒悟过来，对讲话中曲解普希金的《茨冈》和《叶甫格尼·奥涅金》的思想以及宣扬“顺从”等论调表示异议。

另一是他的逝世。他的直接死因，据他的女儿回忆，是由于他因遗产分配问题和妹妹争吵、以致呕血过多而死亡的。也有人说，他逝世前几天沙皇政府一再搜查他的毗邻住宅，逮捕了两个民意党领导人物，他可能因此忧惧致死。出乎他意料的还有，波别多诺采夫在他逝世后“在他住宅里进行了十分认真仔细的搜查”！与此同时，当局却恩宠有加：内政大臣给他一笔安葬费，一位大公出席追荐仪式，财政大臣让皇室侍从长带来亲笔信，“感谢”他“对俄国文学的功绩”，沙皇还决定拨给他的妻孥两千卢布赡养费。搜查和奖赏，黑白鲜明的对照，这已不止传奇成分，而是讽刺性的悲喜剧色彩！

不过，死神毕竟带来了和解。在多达数万人的送葬者间，“有属于各个不同的派别、具有极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观点”，有老年、青年、作家、将军以至“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来埋葬。他真可谓生荣死哀，但这种荣哀里边却蕴含着难以言喻、万古难消的精神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期问题，研究者看法颇有分歧。较为客观而可取的见解是分为三个时期。但其中期只是过渡性的。三个时期有共同之处，也各有特色，这是同各个时期他的遭遇引起的思想变化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的。

处女作《穷人》为前期创作定下基调。它像果戈理的《外套》，以小人物（小官吏、城市贫民）为主人公，但有显著的发

展。作者不只是从外部并且居高临下地表现他们的贫苦和卑微地位,对之表示怜悯和同情;而且从内部并以平等态度展示他们的情感丰富、情操高尚的内心世界。《双重人格》可能借鉴霍夫曼,但仍然有果戈理影响。主人公的姓氏戈利亚德金一词源自“戈利”(голь),即“穷人”。他的精神分裂又使人想起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虽则他是因痴心爱上上司女儿而不能如愿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对这颇多幻想色彩的小说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戈利亚德金被变成“破抹布”,仍有人性的残余。他的精神分裂了。他积聚起幻想出来的一切卑鄙而有效的手段,可又有点胆怯,心曲里点滴道德感情残余阻挠他采取所设想的一切阴谋诡计,于是变成了“双重人格”。小戈利亚德金只是他的胆怯和优柔不决的关于阴谋诡计的幻想的投影。这一分析揭示了这个怪诞故事的现实内涵。可以说,戈利亚德金也是“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变种。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和“双重人格”(作者视为自己的发现)是作者前期创作中两个重要主题,并且以不同程度贯穿于他后期许多作品。

前期创作另一主题是幻想家,表现于《女房东》、《白夜》和《涅朵琦卡·涅兹瓦诺娃》。前两个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脱离生活的青年,一个埋头于学术,一个沉溺于幻想,全都软弱无能,不能奋力争取唾手可得的爱情,《白夜》主人公还全力帮助情敌。作者对他们既是同情又嘲笑的。他们近似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

《涅朵琦卡·涅兹瓦诺娃》是因作者被捕而未写完的长篇小说。小说写主人公的父亲是为了说明主人公性格形成的背景,而且他也是幻想家。主人公自幼就幻想幸福,进入公爵及其女儿家中后,孤独的生活养成她沉思幻想的习惯;狂热地读书有助于认识生活,却又使她远离生活而醉心于幻想。但她寄人篱下,难免与现实冲突。不过,她不再是“脆弱的心”,敢于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小说在她将进入现实世界时中断了,

但她的发展趋势已可想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画廊中她第一个发出社会抗议的声音。

在狱中他写了《小英雄》。服苦役时完全停止写作。创作的第二时期始于充当列兵的后半期。其时正值克里木战争失败，新沙皇亚历山大登基，他鉴于当时形势，决定实行农奴制改革（“改革”有欺骗性，但仍有进步意义）。书刊审查制度也有所放松。作为惊弓之鸟，又受秘密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那时对书刊审查“害怕得要命”。他既渴望发表作品，又得考虑不触法网，从事创作之初十分审慎，选择较轻松的题材，如有喜剧色彩的《舅舅的梦》和《斯杰帕契克村及其居民》。两书不乏讽刺成分，前者还涉及小官吏命运，后者也成功地把福马这个形象塑造成“俄国的达尔杜弗”（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但后一作品写“理想的”地主和专横的管家以及该管家对农奴的无理取闹、倒行逆施，避开农村中主要矛盾，还以牧歌式的大团圆结局。无怪乎涅克拉索夫因它而对作者感到失望。

这个时期的压卷之作《死屋手记》有自传性质。为了逃避审查官的耳目，假托讲故事者是刑事犯，但书中不断暗示他是政治犯。苦役犯在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苦难被描写得“惊心动魄”，但全书的语调平静而委婉。它说事情发生于“过去”，拉开同现实的距离；指出少校很坏而要塞司令受人爱戴等等，以冲淡矛盾……这一切看来是为了“符合审查制度”（他自己说）。有趣的是：审查官甚至还嫌该书把苦役犯生活写得对犯罪者有“诱惑力”，会使人蔑视法纪。可见作者煞费苦心而又颇具匠心。

另一个作品《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回到了作者早期的小人物主题，但还直接涉及他们遭受有权势者和富有者的欺压、侮辱的问题。娜塔莎和父亲、涅莉和母亲的命运，深深使人同情和愤慨。两个凄凉故事平行写来更有揭露力量。瓦尔科夫斯基是作者笔下初次出现的“思想家”——主人公，固然是尚欠完善的雏形。不过，娜塔莎和涅莉两形象表达的是“忍受苦难”

的基督教精神，是“根基论”思想的一种体现。尽管涅莉也有某种反抗意识。

《死屋手记》震动文坛，而作者却是牛刀小试。他的主要成就是他后期的长篇小说。

后期转而写长篇小说，不止篇幅(容量)上的增加。这些长篇是内涵深广的多方面性多主题的作品。有人认为它们是“悲剧小说”。但这一名称似未能概括其全部特征。有人称之为“社会哲理小说”，似较切合实际。持此说者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多为“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社会具体问题，而是沉思人类存在的实体性问题以及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道德伦理的基础问题。人物之间有社会哲理的冲突，有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这些概括是对的，但还比较抽象。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思想家”，什么样的伦理问题，哪些世界观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作者是从什么角度对待这些人物和问题。

后期作品十分复杂矛盾。其所以如此，客观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社会矛盾的激化，沙皇政府的加强镇压。主观原因是：在认识上当他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消极面(特别是它对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的同时，却不承认其相对进步性及其在俄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把它的灾难后果全都看成西方的有害影响；在思想上他慑于沙皇政府的高压，不敢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甚至希望贵族阶级恢复领导作用)，从而把社会问题一般归结为社会道德问题，把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似乎源自西欧的无神论、社会主义，即所谓“虚无主义”，指责这种危险思想毒害青年知识分子，使其丧失宗教信仰，犯上作乱(“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后期作品中真正的“思想家”，除少数外，大多是“虚无主义者”。他要以“根基论”作为“虚无主义”的解毒剂。但他极其矛盾：全力反对无神论和社会革命，却又终生怀疑上帝是否存在，而这实质上又是怀疑应否效忠于以宗教为精神支柱的沙皇和现存制度。正